

# 城市的文学气质及其内涵

## ——以李佩甫、乔叶、南飞雁的创作为例

魏华莹

**内容提要** 籍由李佩甫、乔叶、南飞雁的创作，研究具有地域属性的城市书写与历史探寻，可以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河南城市文学的发展风貌，以及不同代际作家所承递的地域文化精神脉络。就河南城市文学的趋向来说，如何从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汲取资源和营养，审视现代化城市的新动向、新思想，在城与人中找寻独特的文化韵味，进而确立具有自身地域属性的美学原则，成为新的阅读期待。

**关键词** 城市；文学；代际

伴随城市的发展与城市文学的大量出现，城市书写日益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力量，城市文学研究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并且这一热点话题与“70后”“80后”写作，及“文学关注现实、书写当下”的时代召唤具有研究上的交汇点。但也存在暧昧不明的状态，如过分强调城市的现代性，共通的事物多，独特的韵味少。亦有评论家指出城市文学创作存在的诸多问题：“没有表征性的人物”“没有青春”以及“纪实性困境”<sup>[1]</sup>。具体到河南城市文学，如何书写城市文化品格，包括古都文化的历史积淀，中原人特有的人生哲学、生存方式，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改变等，成为亟待研究的新问题。本文尝试以李佩甫、乔叶、南飞雁的创作为例，研究具有河南地域属性的城市文学书写及发展脉络。通过他们对于城市的不同理解和表述，进行对读，借以发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河南城市文学的发展风貌，以及不同代际作家所承递的地域文化精神脉络。

### 一 城市与乡村

“50后”作家李佩甫一直坚守在河南的土地上写作，其作品也折射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河南文

学从乡土到城市的变迁史。《城的灯》《羊的门》<sup>[2]</sup>等已经显示出其注重对中原权力结构的呈现，对土地、气味、植物的迷恋，在他的持续写作中，多是一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挣扎在城乡之间，始终存在城与乡的双重参照。城市是物质的聚集地，乡村是精神的栖息地；城市代表文明、现代、富有，乡村代表田园、理想、贫困。

在长篇小说《城的灯》中，“四个兜”是农家子弟冯家昌的第一个人生目标。“穿上‘四个兜’，这就意味着他进入了干部的行列，是国家的人了。”<sup>[3]</sup>尽管他无限怀念“谷草的清香和拌着青春的腥香，把一个小小的窝铺搅和成了一锅肉做的米饭！”但仍决绝地放弃乡村和美好的恋人，走入城市，期间的挣扎与选择也被认为是“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视野里描写了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的精神史”<sup>[4]</sup>。

雷蒙·威廉斯分析乡村与城市时曾有这样的观点，“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sup>[5]</sup>这样的理论依据同样可以在李佩

甫的小说中找到对应。如《城的灯》冯家昌因进城导致的背信弃义和性格异化，以及香姑所代表乡土文明的仁义厚重。

李佩甫说：“《城的灯》是写逃离的，就是从土地逃离乡村，是一种对灯的向往、渴望，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叛逆。”<sup>[6]</sup>不管是记忆中的理想田园，还是现实中的城市野心家和梦想家乐园，逃离农村还是成为一代人或数代人的宿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对立所导致的乡村集体贫穷带来的屈辱，在路遥、贾平凹等作家笔下多有描述，这也使得我们在阅读作品时，既对不断涌现的进城故事的种种背叛行为表示憎恶，但又不乏同情和理解。

在《生命册》中，故事开篇就是决绝的出走，是主人公刻意割断乡土关系，进入城市的故事。作为一颗被移栽进城里的种子，吴志鹏在城市读大学、读研究生，有了单位、扎根落户，但不堪故乡亲人的屡次打扰，无法忍受种种超出他能力的重负，只好选择逃离，将个体从乡土阴影中挣脱出来，但却时时感到自己的“黄土标记”，并自认在城市中，只能永远是一个流浪者。吴志鹏的“还乡”之旅也成为一种隐喻，在城市中漂泊的人们如何寻求心灵皈依的问题，在无尽的追逐金钱和欲望的时候，人如何同自我的精神世界和解的故事。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对《生命册》授奖辞写道：“在从传统乡土到现代都市的巨大跨越中，李佩甫深切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们”；“《生命册》正如李佩甫所深爱的大平原，宽阔深厚的土地上，诚恳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sup>[7]</sup>。

相较而言，《平原客》是李佩甫文学系列中较为洋气的作品，融入很多现代事物和城市的新思考。主人公李德林虽出身农村，但通过高考进入城市，并凭借卓越的学识迎娶教授的美丽女儿，自己也漂洋过海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是一个有着洋墨水的被中西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但在李佩甫笔下，从外在到心灵，他并没有和土地裂变，而是始终保持“乡土性”。多年的汉堡包没有改变他的脾胃，多年的西化生活也没有改变他的灵魂，从外表看他仍然像一位农民。即便贵为省高校副校长时，他看上去仍是一个“比农民还农民的小老头”。

作品也在借警察赫连东山反思代际的问题。他是一位优秀的警察，却和儿子有着深深的隔阂，儿子从小喜欢打游戏不服管，在他眼里是典型的不成器。但就是这样的儿子，大学时能靠打游戏卖装备赚钱，毕业后就能拿到30万、50万年薪，而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才年薪不到5万。故事中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他劝说儿子辞去年薪30万的工作，找一个正经工作干。而在染着红头发、戴着大耳环的“90后”眼中，赫连东山就是老顽固、土鳖，引发儿子粉丝的追骂。他心里也清楚：“这不是你的时代了。”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现在中国的青年人，都是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独生子女政策之下，经历了家庭中众星捧月般的无尚呵护，同时也面临着市场经济时代残酷的差别和竞争”，“这些构成了这代人特有的社会经验或集体认同，使之区别于他们的父母——不仅仅在年龄上、经验和意识上，也在价值观和生涯选择上”<sup>[8]</sup>。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李佩甫的“平原”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它可以有忠诚的“50后”所理解的伟大、理想、正义，甚至包括对工作正经、不正经的划分；也会有奇异的“80后”“90后”“我的青青我做主”的不流俗，坚持自我的兴趣与个性。在这部看似差异很大的书中，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城市的多维空间，有不同代际对于人生的不同理解，有出身的烙印导致的认知和生活习惯差异。而在故事的讲述中，作者将农村青年与留美博士的身份缝合，将官与商的职业生涯勾连，呈现一个现代性的多元城市景观。在这个城市景观中，不仅仅有传统记忆的合记烩面，还有新兴的高档会所；既有古老开封的“德化浴池”中精炼的手艺人，也有城市新冒出的按摩女郎。土与洋组装成城市，所有人既改变着城市，也被城市悄悄改变。

## 二 欲望与救赎

“70后”乔叶最早是一位散文作家，写出许多青春雅致的美文。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守口如瓶》，写一对双胞胎姐妹，进入城市之后迅速被金钱吞噬而堕落的故事。姐姐一开始是因为家贫，为了赚钱帮助妹妹读书，选择在洗浴中心工作，后来在城市

生活中逐渐被改变，完全物化，并尝试用金钱的力量教育妹妹：“有了钱，能干的事情太多了”；“有了钱，我不再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庄稼，不用再在土坷垃里刨那几个柴米油盐钱，不用再受杨守泉那种东西的腌臢气”；“有了钱，我们才可以真正善待自己”<sup>[9]</sup>。

在这种价值观和逻辑论的指引下，妹妹也迅速沦陷，和姐姐一起卖淫，向着积攒“一百万”的目标前进。乔叶谈起自己写作这个故事源于家乡村庄里发生的变化，一些年轻女子外出打工去赚钱，钱来得很快，迅速改善自己和家里人的物质生活。可以说，那段大潮来临时，忽然把人的道德底线冲刷掉了。这也是小说中的冷红甚至不惜破坏妹妹的爱情，也要捆绑她和自己一起赚钱的原因。在金钱的诱惑之下，她们一步步地让自己的精神走向了苟且。尽管乔叶在首部长篇中就表现出对于人性的追问，对生活的热爱，但也没有避免将城市平面化地塑造成金钱和欲望的黑洞。但可贵的是，作者试图在追问，如果说之前的堕落是迫于生活，那么之后为什么还一再自我放纵，是不是有什么惯性的牵引或是人性的扭曲，这也是作家留下的深层思考。

《拆楼记》是乔叶自觉参与的“非虚构”创作潮流的产物。《人民文学》自2010年开始倡导“非虚构写作计划”，呼吁作家走出书斋，走向民间和生活现场，“借助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力图通过‘客观叙述’，从不同的侧面向读者呈现底层生活的真相。警惕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上的‘先入为主’，直接进入生活现场去发现生存的秘密”<sup>[10]</sup>。“非虚构”文学被认为是“文学和现实、读者建构关系的重要通道”<sup>[11]</sup>。据乔叶回忆，在与李敬泽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聊天时，谈到自己姐姐家村庄拆迁的故事，并在对方的鼓励下将之写成小说。

在乔叶笔下，拆楼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记录，而是卷入其中的人的心理变化，姐姐和村民在得知市里要规划道路，村庄要整体搬迁时，迅速借钱加盖房屋，以期赢得更多的补偿款。这个过程中，“我”曾经的老师，包括“我”自己也卷入这场盖楼、拆楼的大戏中。在历经公开上访、私下打探、找领导等各种操作之后，张庄还是被拆掉了。

乔叶以一个复杂的抗拆故事，还原了作为主体的拆迁户，描写了他们的内心对利益的盘算，对法律的蔑视以及自成一体的农民逻辑。拉韦尔指出：“艺术是社会的表现，当它遨游于至高境界时，它传达出最先进的社会趋向；它是前驱者和启示者。因而要想知道艺术是否恰当地实现了其作为创始者的功能，艺术家是否确实属于先锋派，我们就必须知道人性去向何方，必须知道我们人类的命运为何。”<sup>[12]</sup>乔叶的作品中，多是对人性的拷问和反思，长篇小说《认罪书》、中篇小说《黄金时间》等皆是如此。

《藏珠记》却是乔叶的“变法”之作，她之前写的作品多是较为沉重的社会现象和人性反思，《藏珠记》则轻盈地写成一部带有奇幻色彩的小说。天宝十四年，一位波斯商人因感念房东夫妇的收留，在弥留之际送给他们的女儿一颗长生不老的珠子，因此，那丫头活得很长久，一直从唐朝活到了现在。阅尽千帆的底气和苍凉使得唐珠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鲜之事”。这个传奇的故事看似结构简单，古老而有着不死魔力的女子爱上一位人间男子，最终抛开阻碍，修成正果的故事。一方面是历史的沉重，甚至作品中刻意引用大量的历史知识，有唐代的传奇故事，有豫菜的渊源与精工细致；更有现实的轻，只是一个U盘引发的阴谋与爱情。最终，爱情的快乐原则压倒历史的沉重阴影，也压倒了现实的俗世原则，其实这就是现代城市的新状态，被乔叶不经意间展示出来。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源自本我，它的角色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人。它往往代表了超我所蕴含的那些社会的道德伦理和理性判断。在弗洛伊德的比喻中，本我是奔腾的“野马”，自我则是控制马的“骑士”。在这样的人格结构基础上，本我是依照快乐原则行事的，而自我则依照现实原则行事。快乐原则就是本能的满足，而现实原则是符合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良知<sup>[13]</sup>。现实原则常常压制着或延迟了快乐原则的实现，这就造成了文明对本我的压抑。在《藏珠记》里，一切矛盾都烟消云散了，甚至那条千年古训对珠子和人的约束力也荡然无存了，一切符合现实原理和快乐法则。历史和现世得到有效统一，日常成为关注重心，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使命感，

仅仅是一对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

乔叶为什么要写出一部快乐之作呢？据作品《后记》讲述，一方面是个人的生活遭遇波折，在沉重的人性黑暗面前尝试写一篇轻盈的作品使自己感到愉悦；另一方面是追剧，源于对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喜爱，尝试写出一篇“任性”的作品。也许是经历多年的城市生活之后，她也在修正自我的观念，城中人在摆脱最初的物质欲望之后，更需要精神世界的重建以及与自我内心的和解。所以，在《藏珠记》中，才会有触目惊心的城市变迁，高楼迭起的经济神话和时代扩张精神，现代化的外部样式的诸多呈现，以及摆脱物欲之后轻盈的人们所向往的纯粹心灵和凡俗生活。

### 三 灰色的人生

“80后”作家南飞雁成名较早，大学就读中文系，读书时出版长篇小说《冰蓝世界》《大学无烦恼》等。“我的七厅八处”系列是他近年来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刊物上发表的系列中篇小说，后以合集的方式编入《天蝎》，多是描写公务员系列，讲述他们人到中年卑微而自尊的生活。之所以选择这类题材，源于作者所言，自己的朋友和同学多与文学无关，却广泛分布在政府机关里的某厅某处，自己对他们的生活很是熟悉，自然地就写进文学作品中。

这些故事都涉及官场、公务员的工作与爱情生活。尽管作者写到他们人到中年的圆滑世故，又有着在现实面前的卑微，真实的映照更能显示出小人物在生活面前的无力与苟且。故事男主人公多设置为中年男性公务员，离异无子，面临对工作晋升的无限渴望和爱情婚姻的重新选择。在世故的考量面前，《红酒》中的简方平面对刘晶莉的暧昧很有底气：“我好歹也是个副处级干部，你刘晶莉算什么，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也把自己端起来么？”而享受暧昧的过程，被他比喻成“就好像一个初次到自助餐厅的人，蓦地发现那么多随便挑选的美食，谁都不会仅仅往盘子里放上几片面包，直接吃饱了就走人”<sup>[14]</sup>。同样，对于《暧昧》中的聂于川来说，暧昧对象也得和职场官位的利益原则挂钩。

如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跟钟厅长交情莫逆，又曾追求过他，还是离了婚的，内因具备外因有力，只要运作得当，还愁副处长被老孙抢走？还愁赶不上大提拔的末班车？<sup>[15]</sup>

《灯泡》则写了少有的正直人物穆山北，他性格耿直，在审职称材料时首先把书记夫人的剔了出来，判曰论文造假。在领导根本没把他当回事，掂起“初审通过”的戳子盖了之后，他抓着论文找领导评理，领导不表态，他就写了封实名举报信，直呈厅高评委。由此一战成名，轰动全厅。但也因此走了多年的背运，一直提拔不了，被视为“灾星”，去哪里都被嫌弃、冷落。一直到九处后，自己心里着急，也改变了生存姿态，后在岳父的运筹帷幄之下得以晋升科长。混了20多年，他这才明白走仕途和当黑嘴灯泡并不矛盾。对他来说，40多岁了，儿子挺争气，老婆有本事，自己呢，总算也提拔了，人生算是舒口气。《灯泡》不同于其他小说主人公的油滑世故，写出一个耿直的人如何在公务员队伍中落落寡欢，因为不作假、不迎合、不世故、不功利，而处处碰壁的委屈人生。作为读者，看到穆山北毫无顾忌地坚持原则，尤其是他大闹四处审计的故事让人读来酣畅淋漓，他将老齐挤兑得体无完肤、走投无路，又把小高处长证得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然后面对围观人群“点头离去，穿越人群，走得器宇轩昂”。然而，这一切正暗合心机颇深的九处处长小肖的计谋，侧面完成一个小肖识大体、顾大局，竞争对手小高刻意找茬的故事。而恰恰是不经间充当了领导的枪手，才换来穆山北的晋升。

《空位》围绕着一个事业单位编制的问题来讲故事。小蒙本科毕业，因父亲在设计院做没实权的领导班子成员，得到工勤岗，一直在为编制的空位努力。而研究生晓嫣父女也在为这个编制暗暗较劲。在老蒙的运作下，晓嫣一度弱势，其父虽为科级干部，不惜釜底抽薪，运用自己手中权力，坚持要查账，才换来女儿的空位编制。作为知识女性，晓嫣为了空位不惜献身小蒙。小蒙的恋情也很值得深思，双方本是大学恋人，因小蒙父母不同意只得分手。多年后重逢，小蒙是打扫卫生的工勤，美如已在公司混得风生水起，女强

男弱的不平等地位使得二人得以再续前缘。而吊诡的是，小蒙已然知道美如是依靠委身领导换来的职位，且一直保持着不正当关系，却毫不在意，选择继续结婚。毕竟，在为等待多年的空位竞争过程中，深受煎熬的他，已经明白尊严在生活面前的不值一提。

现在的小蒙，已不再是以以前的小蒙了。他不住地提醒自己，他想要的无非是一个老婆，一段婚姻，而不是因为女友出轨愤而分手，况且这出轨来自于她讨生活的本能。分手是容易，逞了一时之快，到头来什么都没落下，未免太悲催。在研究院多年，要是这点账都算不明白，真是白混了。<sup>[16]</sup>

这个故事读来使人悲怆，曾经的纯洁青年，从追逐空位开始，几年里他陆陆续续把理想、尊严、底线统统埋葬进去。晓嫣是音乐系研究生，为了一个空位出卖自己，向小蒙献身。美如亦是如此。读罢让我们不禁感慨人的自我异化，在利益、诱惑面前人性的不堪一击。

这些机关、单位的人为了“位置”争抢了一辈子，直到快退休才想明白。在《天蝎》中，作者借老冯之口讲：“你老弟算人到中年，老哥我都五十大几了。在这个年纪，身体健康，略有积蓄，孩子听话，老婆还在，事业上不至于丢人，也就足够了。至于升官发财，多它不多少它不少，仔细想想也就他妈的那回事。”<sup>[17]</sup>局外人也许会淡定，但是置身其中的人所耗费的心机、所承受的屈辱实在令人唏嘘，也显示出现代社会竞争机制下人性的可怕与生存的不易。

对于“80后”作家来说，写城市生活是他们比较熟悉的情境，南飞雁称之为“天生天化”。在其成长环境中，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兴起并迅猛发展，他们的成长就是伴随着城市的成长同步进行的，关注城市人的生活状态和城市变迁成为他们作品的重要内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他们能适应多元化的世界，又同时能对现代城市人的生活状态、生存困境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和反思。对于南飞雁来说，曾经的同学多数进入公务员序列工作，这样的朋友圈也使得他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体制内人物的生存真相，并以文学的方式加以表现。

## 四 历史的探寻

有意味的是，在李佩甫、乔叶、南飞雁的近作中，都有意开始了历史的探寻，并确立创作的地域文化属性。如李佩甫写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的《河洛图》、乔叶写豫菜的《藏珠记》、南飞雁写古都开封的《省府前街》。城市的历史、风物成为其着力表现的对象，作家都做了许多细密的考证，尽可能地还原城市的传统文化与古老韵味。

《河洛图》书写的是300年前河洛康家百年财富神话的兴衰起伏，其间有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典籍、算盘、测字、石窟佛像、中医药方、豫剧、易学风水等”<sup>[18]</sup>，以及“礼义仁智信”的儒家文化。康百万庄园又名河洛康家，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始建于明末清初，被誉为“豫商精神家园，中原古建典范”。“留余”的经营理念，也是契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思想。正是依靠这一家训，康家得以做大做强。文中借康秀才之口谈“留余”，幼学先生的《四留铭》曰：“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sup>[19]</sup>又进一步解释，大凡世间，立志不难，穷其志也不难，难在“留余”。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众所周知，“留余”家训的匾额现在还悬挂在康百万庄园中，是康家数代人格守的家道、仕道和商规，也是儒家“财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中庸思想的体现，与恢弘的明清建筑群、钦赐御封的“康百万”名号形成参照，传递出取舍有度的人生智慧。

乔叶的《藏珠记》虽是写穿越和爱情，却用大量的笔墨谈论豫菜。为了准备写作素材，她还多次采访豫菜大师李志顺，并在书中辟有章节《惊黄瓜资格证》《厨师课》，男主人公也是豫菜的传承者。书中的“惊黄瓜”，简单的一道菜却大有讲究，还要有资格证书，并用大段笔墨描述松爷“麻腐海参”的选材、工序的讲究。全书更将饮食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详细讲述食材的选择、豫菜的地位，以菜喻人，人菜合一。

豫菜嘛，甘而不浓，酸而不酷，咸而不

涩，辛而不烈，淡而不薄，香而不腻……你别笑。豫菜做到了功夫，就是这么好。没特点？不，咱们有特点，咱们的特点就是甘草在中药里的作用，五味调和，知味适中。所以内行常说，吃在广东，味在四川，调和在中原。<sup>[20]</sup>

河南的饮食文化在整部作品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豫菜在北宋时期已经成为宫廷菜系，由于中原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和烹调技艺，又兼收并蓄各菜之长。书中甚至将饮食与人心契合在一起，“安胃”才能“给我欢愉，让我踏实”。所谓安慰，就是“安胃”。在豫菜考古、人菜合一的讲述中呈现古老与现代的城市气质，在古今融合中将千年历史的沉重以及往复现世的轻盈跃然纸上。

南飞雁在长篇小说《省府前街》中，也开始调整自己的写作，以文学的视角发现城市，书写古都开封城与人的传奇。故事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讲起，省府前街的沈宅大小姐奕雯大闹父亲续弦。此时已西风东渐，正室夫人惠葳欧游多年不归，夫妇二人隔着万里重洋书信对阵，文言吵过用白话，后来又用英文，吵到第三个年头，惠葳索性寄回一纸离婚书信。作品细密考证开封的老街道、古物、民俗，各个重要时期的历史文件等。如写开封老街：

开封城里老街不少。千年的有，像南北土街，宋代叫土市子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千年之前已是繁华鼎盛的去处。

百年的就更多。像省府前街，原来叫行官角，乾隆十五年这里是行官，接待了巡视黄河河务的乾隆皇帝；两百多年后，这里又成了行官，光绪二十七年太后皇帝两宫回銮，从西安到京师，一路上走了九十多天，在开封就待了一个多月，就住在省府前街，老太后住得高兴，还在这儿过了六十六岁大寿；到了民国，行官则成为豫省省府所在地，从民国十六年到二十五年，从冯焕章到商起予，十年里换了五任省主席，时间长的三五年，短的寥寥数月而已，在省府前街走马灯似的轮番登场。<sup>[21]</sup>

小说也写到了各类城市风俗，包括节日、民俗，传唱的曲目，等等。《春秋配》是开封梆戏最叫座的一出，《捡柴》是最叫好的一折。书中也借春玉唱出乱世的飘零和委屈。

送仁兄送至在柳林之下  
荒郊外风光好叫人爱煞  
来到了山涧坡用目细撒  
见一老和一少在捡芦花  
老妈妈她不过六十上下  
观大姐也不过二九年华  
看穿戴非出自小户家下  
却为何在荒郊眼里发麻<sup>[22]</sup>

此外，还写出开封城的诸多老字号和老建筑，如陆稿荐、豫盛和、包耀记、晋阳豫、德润和、又一新等等。在南飞雁笔下，城市记忆更多成为一种风物、一种传奇。作品通过追忆开封历史，从日寇入侵、国共内战，直至新中国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写出长二十世纪乱世人的命运漂浮，又以香港的数封书信打开了外部视野，形成文本参照。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背后，却有着中原人特有的云淡风轻、处变不惊的人生哲学。故事结尾处，面对新的社会秩序重建，昶达还在劝慰书芾：“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的真面目的时候，你或许可以像罗曼·罗兰那样，像贝多芬那样，像米开朗琪罗那样，像托尔斯泰那样，注视它，并且爱它。”<sup>[23]</sup>

如果说之前的《天蝎》更多书写城市小公务员的生存、爱情、职位等诸多纠葛与挣扎，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剖开当下城中人的生存史和发展史，《省府前街》则体现“80后”作家自觉追寻城市历史的意识，以及如何讲述城市命运的前世与今生。南飞雁说写这部小说，更多基于自己对城市的好奇，对古都的历史回望。“每一类人群都提供一种阅读城市的方式。”<sup>[24]</sup>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代际作者在寻找历史中所呈现的文学想象，以及在历史的探寻中所发掘的城市记忆。

## 五 气味与韵味

陈晓明曾在《城市文学：弯路和困境》中提出：“所谓城市文学就是表现了城市生活并包含了一定城市意识的作品。”而什么是“城市意识”？“即叙述人或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意识到城市的存在，意识到他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方式与城市相

关，他在思考他在城市中的存在状态。在大多数情形下，这就是现代个体自我意识”<sup>[25]</sup>。文学艺术对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老舍笔下的北京、王安忆的上海、贾平凹的西安等，都展现出城市的灵魂。也有评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是到20世纪90年代部分“新生代”和“70后”作家笔下才得以接续现代都市文学的“小传统”，“可他们的城市书写似乎带有表象性和装饰性，这些作家作为城市的主体，是否在写作中渗透了城市精神的自觉？的确，城市文学还是要基于一种城市精神，这种终极精神不仅仅只是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它一定还有底层社会的冷暖自知”<sup>[26]</sup>。

进而分析李佩甫、乔叶、南飞雁的创作，我们会发现，不同代际的作家，他们的文学表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长达40多年的写作中，李佩甫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家中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存在。《羊的门》写出中原乡土特有权利结构的复杂性，到《城的灯》出现决绝的进城力量，再到《生命册》作为“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可视作家融汇40多年创作的心灵史，同样也是追溯时代与人的一曲悲歌。吴志鹏为了逃离乡村及其影子，辞去公职，选择下海，经历无数困顿，却始终找不到心灵的安宁。对李佩甫来说，他一直试图写出人们在社会结构变动中的心灵史，直到《平原客》，虽然在书写大量城市元素、现代事物，但仍将精神世界安放于乡土，始终存在城市景观、新奇事物与固有的传统习气、乡土情怀的冲突与挣扎。

乔叶的小说更为关注城市中的人性，注重表现人们在城市诱惑中的各种欲望与挣扎。在非虚构小说《拆楼记》中，“她以自剖其心的态度，见证了她的所见和所知”<sup>[27]</sup>。盖楼是为了拆楼，在拆迁补偿款面前，村民既团结一致，又相互内讧，不惜动用各种资源、智慧，以图在城市化进程中分一杯羹。这些人曾是和和气气，但在利益面前忽然撕破了脸，呈现出种种“人性之恶”。李云雷在谈及这部作品时，提到叙述人的姿态问题，作品中的“我”的优越感并非来自于思想和知识的高深，而是来自于“我”作为城里人的地位与身份<sup>[28]</sup>。不可否认，这也是一种生活真相，显示出这一代人虽

然精神城市化，但仍无法割裂原乡的纽带与复杂关系，以至于仍是处于被裹挟前进的时代浪潮中。

对于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来说，很多作家就生长在城市，这也使得他们可以在作品中更好地表现城市生活、关注城市人的生命状态，作品具有更多的城市意识，并消除掉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如生长于北京的某“80后”作家所说：“50年代的作家即便生活在城市里也对农村念念不忘，我只能自觉地书写城市，他们所要逃离的，正是我赖以生长的。”<sup>[29]</sup>南飞雁的创作亦是如此，他熟悉城市生活，更关注城市人的生存状态。在小公务员序列中，他通过还原现实人生写出困境与无奈；而在寻找大历史中的城与人书写中，通过细密的考证，还原一座城的文化元素与命运沉浮。对于他来说，即便写一座古城，在寻古之旅中也着意呈现其现代性品格。如故事开篇，就出现沈家大小姐沈奕雯拿枪打掉继母半个耳垂，大闹父亲婚宴。她的母亲更是一位新女性，旅欧不归，一纸离婚书还了自由身。古老的城市风物与现代品格融为一体，显示出其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与独特性。

在生活经验日益同质化的今天，作家如何提供个体经验，展开独特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成为衡量作品意义的重要层面。具体到城市书写中，城市不仅仅是现代化事物，它还有久远的文化余脉，以及“等等灵魂”的精神拷问。城市文学的书写同样有着多重面向，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李佩甫的城乡之间的挣扎与犹疑、接纳与融入，还是乔叶的城市变迁中外部景观的变化与内在肌理的承续，南飞雁试图发现的灰色人生哲学，以及他们共通的在历史的追寻中寻找传统余脉，都展现出独具风格的发现与思考。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代际之间并非简单的价值与经验的对立，而是不同的成长史与个体经验的差异所带来的城市书写的不同面向，如李佩甫作为“50后”作家执着的乡土怀旧情怀、乔叶作为新移民视角的城市化进程再现和道德审美积习，南飞雁对城市利益法则和物质主义的现实书写，以自我精神世界映照的方式呈现了对于城市人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的人文思考，也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多重面向。

而在寻找城市的地方属性与独特韵味时，作

家更多转向历史文化底蕴的探寻,以风物作为城市象征,寻找集体人格与精神脉络,在文学叙事与文化意象之间建立同构性。城市的韵味来自历史、风物与民情。细读李佩甫写“康百万”的家族小说《河洛图》,乔叶《藏珠记》对豫菜的反复书写,以及南飞雁《省府前街》对古都开封的追忆,会发现他们的作品在想象路径与怀旧意绪中勾画出的城市文化地图,地理、文化、心理之上的古与今、东与西、城与乡之间的差异性得以呈现,并注重表现中原城市的精神气质,如“平正通达”的河南文化,“留余”的仁义精神、地方语言的借用等。就河南城市文学的新趋向来说,如何从古老悠久的历史中汲取资源和营养,并审视现代化城市的种种新动向、新思想,在城与人中寻找独特的文化韵味,拓展表现空间与审美格局,在物的挤压之外,寻找人的文化品格,进而确立具有自身地域属性的美学原则,成为我们更多的阅读期待。

[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文学地理学视阈下当代河南小说研究”(批准号2020GGJS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1] 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4年第2期。
- [2] 长篇小说《羊的门》由华夏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一个月内印刷两次、五万册销售一空,旋即因“问题”被停止发行。后在201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之一,也算是对作品的正名。
- [3] 李佩甫:《城的灯》,第5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 [4] 何弘:《坚忍的探索者和深刻的思想者》,《小说评论》2013年第2期。
- [5]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第1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 [6] 孙竞:《知识分子的内省书——访作家李佩甫》,《文艺报》2012年4月2日。
- [7]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授奖辞》,《文艺报》2015

年9月30日。

- [8] 吴晓英:《代际冲突与青年话语的变迁》,《青年研究》2006年第8期。
- [9] 乔叶:《守口如瓶》,《中国作家》2003年第10期。
- [10] 张柠、徐珊珊:《当代“非虚构”叙事作品的文学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
- [11] 孟繁华:《非虚构文学:走进当下中国社会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2日。
- [12]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第114页,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 [13]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第202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 [14][15][16][17] 南飞雁:《天蝎》,第15页,第72页,第265页,第3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 [18] 袁恒雷:《以不尽之巧以还造化——评李佩甫新著〈河洛图〉》,《文汇报》2020年7月3日。
- [19] 李佩甫:《河洛图》,第188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 [20] 乔叶:《藏珠记》,第125页,作家出版社2017年版。
- [21][22][23] 南飞雁:《省府前街》,第24页,第190页,第444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发麻”为河南方言,指悲伤落泪之意。
- [24] 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第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25] 陈晓明:《城市文学:弯路与困境》,《文艺争鸣》2014年第12期。
- [26] 青屏、刘波整理:《城市文学的精神底色和现实境遇》,《长江文艺评论》2018年第3期。
- [27] 李敬泽:《〈拆楼记〉令人不适的写作》,《新京报》2012年7月23日。
- [28] 李云雷:《“非虚构”的叙事伦理与理论问题》,《长江文艺》2016年第10期。
- [29] 霍艳:《我如何认识我自己》,《十月》2013年第4期。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艳